

《闻道》2019年第2期精彩推送

【编者按】《闻道》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自创刊以来，《闻道》一直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在本期的推送中，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2019年第2期《闻道》。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高玉生大使，听高大使讲述乌克兰困境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政治思索板块精选四篇短文，研习不同人眼中的“政治”。大国风云板块纵览大国动态，浅析中国、美国、欧盟、印度等大国政治。百花齐放板块向大家分享我院学生赴日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的感受、学长学姐求职以及申请交流的经验体会。



- 大使访谈：听高玉生大使讲述乌克兰困境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
- 马岩峰：“国强必霸”还是“繁荣稳定”？——20年后对江忆恩MID模型的验证
- 曹宇航：政府渗透能力视角下印度“潘查亚特”制度的演变
- 我院学生赴日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有感



2019年第2期
总第26期

主 编：
江 源

本期执行主编：
夏 菁

编 辑：
(按拼音字母排序)
陈 卉 陈瑞琼 曹宇航
李 睿 沈丹丹 徐晓晨
殷 悦

封面题字：
冯绍雷 贝文力

本期指导老师：
阎德学 鲁 静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目 录

卷首语

随笔感悟
..... 夏菁

大使访谈

语 听高玉生大使讲述乌克兰困境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
..... (01)

政治思索

政治的含义及其实践
..... 殷悦 (07)
政治的定义
..... 孙淳蛟 (13)
What is Politics?
..... Paulo Pliego (16)
国家和政体
..... 于士隽 (23)

大国风云

“国强必霸”还是“繁荣稳定”？——20年后对江
忆恩 MID 模型的验证
..... 马岩峰 (27)
欧盟-美国关系是强化还是弱化
..... 夏菁 (44)
《民族主义时代美国大战略》有感
..... 陈卉 (52)
政府渗透能力视角下印度“潘查亚特”制度的演变
..... 曹宇航 (60)

百花齐放

我院学生赴日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有感

..... 杨胜兰 张严峻 朴荣浩
..... Dinara Rakhimzh Anova 赵亚娜 (76)
求职经验分享

..... 李冰岩 (84)
找准自己的定位——申请日本交流有感
..... 余抒芮 (91)

国关要闻

解析中俄关系发展的重点问题

高玉生大使做客“大使讲坛”
..... (93)

我院师生应邀赴挪威参加“2019 北极论坛”
..... (99)

倪世雄教授做“中美关系再出发——纪念中美建交 40 周年”讲座
..... (101)

世纪之交中俄关系亲历记
于振起大使做客“大使讲坛”
..... (107)

我院举办“主要大国、区域国家与世界秩序”国际研讨
..... (114)

周力大使做客“大使讲坛”
回顾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历程
..... (122)

张德广大使做客“大使讲坛”
回顾展望中俄关系
..... (128)

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博士生论坛”
..... (132)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办,是学生自主管理发行的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2011 年 3 月发行第 1 期。

本刊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理念,设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文艺专栏等特色栏目。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 座 406 室(邮编 200062)

邮编: wendao_ecnu@163.com
网站: <http://www.saias.ecnu.edu.cn>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大使访谈·高玉生大使



高玉生大使：曾任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驻乌克兰大使、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高玉生大使在访谈中解读了乌克兰政治、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的困境，分享了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意义，并寄语国关青年学子，勉励其要努力学习知识、树立为国家奉献的精神和信念。

陈卉：《民族主义时代美国大战略》有感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外交战略开始转向保守，民族主义时代的美国到来了，作者 Hal Brand（哈尔·布兰德）在《民族主义时代美国大战略：美国堡垒及其替代战略》（*U.S. Gr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Nationalism: Fortress America and its Alternatives*）中介绍了美国在民族主义时代下通常采用的战略一种是“美国堡

全”一种是“温和的美国民族主义”，本文则从特朗普现行的政策去分析当今美国外交是符合上面哪一种模式，以供丰富读者理解美国外交的角度。

曹宇航：政府渗透能力视角下印度“潘查亚特”制度的演变



潘查亚特（Pandhayat）是在印度存在了很久的一种乡村管理机构，意为一—五老会。潘查亚特管理制（Pandhayat Raj）是印度独立以后在旧的制度上发展起来的乡村自治制度，又称乡村评议会制度。在印度历史上缺乏强力的中央政府和强效的动员组织能力的情况下，潘查亚特制度是印度政府和印度农村社会接触的媒介，在动员组织能力更有效率的现在，潘查亚特是在政府权力之下实现农村发展和管理的工具和组织。在政府的有意引导之下，现在的潘查亚特承担了非常多的诸如农业发展、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任务，随着政府的逐步放权，潘查亚特在印度的乡村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我院学生赴日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有感



本期国关学子游学来到了日本东京,2019年6月29-30日,应东京大学邀请,我院师生共同参与了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期精选五位同学赴东京参会的感受和体会,与大家分享。

本期主编: 夏菁

《民族主义时代美国大战略》有感

陈卉，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该文章由国际问题研究导论课程教师王铁军推荐。）

美国学者 Hal Brand 专注于研究美国外交，在他的论文 *U.S. Gr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Nationalism: Fortress America and its Alternatives* 中主要讨论了美国在民族主义年代下所采取的大战略，一种模式是“美国堡垒”——这是一种强硬的、几乎是零和的方法，它将积极地扭转战后的国际秩序，并以大量的单边主义、近代孤立主义和现代孤立主义为特色。这种模式是黑暗的，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在其花言巧语和一些早期政策中，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堡垒式的做法不谋而合。然而，还有另一种模式，一种更温和的模式——温和的美国民族主义，可能被认为是带有民族主义口音的国际主义。这种做法不会从根本上摧毁战后的国际秩序；重点将是确保更好的交易，更平均地分配负担，并提高美国在这一秩序中的相对地位。第一个模型代表了通往超级大国自杀的道路，也是一个更加丑陋、倾向方混乱的世界；第二种方法会涉及一些真正的缺点和干扰，但也许可以帮助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

作者首先介绍了二战以来的美国国际主义。二战表明，全球环境在经济和安全两方面都从根本上变得相互依存。因此，它迫使美国决策者超越了狭隘的美国利益，并通过建立一个总体的国际体系来保护这些利益，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可以繁荣和安全。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承诺领导一个开放和繁荣的全球经济，为关键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提供担保，推进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主义理想，并在各种机构嵌入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样的国际主义政策使得美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使得美国在军事支出上远远超越于保卫自己领土所需的军事支出，在二战后美国主动发起的一些战争也使得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际秩序。但是美国从这种国际主义政策中也获益良多，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安全，使得美国本土免遭袭击，美国对于反恐的努力也使得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在美国领导建立的自由的全球市场中，他自身也受益良多。

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以及伴随全球一体化而来的脆弱性、经济增长等问题的越来越多。美国本土出现了民族主义复兴的现象。2016 年，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民族主义进入到一个不能令人忽视的境地。

他将 TPP 称为“对我国的强奸”，谴责现有的邻国自由贸易协定，并承诺实行高关税和经济保护主义。他将北约贴上“过时”的标签，加强美国主权和边境管制，并表达了对华盛顿自己帮助创建的各种多边国际机构的一个苛刻的怀疑。他甚至恢复了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优先”的口号，唤起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完全拒绝的呼声，并且重新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

因此，特朗普对美国战后的国际主义的核心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敌意。

那么特朗普的执政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发生多大的变化呢？

上文提到一种模式是“壁垒美国”模式，一种是“更好的民族主义”模式，下面分别来介绍两种模式。

“壁垒美国”代表了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强硬的版本，充满了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强大元素。它建立在全球事务的几乎零和逻辑之上——特别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其他国家多年来一直系统地利用美国的慷慨和开放，为自己争取了过多的利益。

“壁垒美国”的主要要素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堡垒的核心支柱是经济民族主义。美国将从自由贸易协定中退出，并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因全球化而被削弱的产业，从而取消对开放全球经济的支持。华盛顿也将更频繁地在世界贸易组织进程之外运作，也许完全退出该组织，它将强调经济主权。美国的政策将严厉惩罚从事离岸外包或外包的美国公司，也许是通过高边境税，并以“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人”为特征。同样重要的是，“壁垒美国”将寻求使美国免受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也许是通过追求现代的“曼哈顿计划”来实现“能源独立”。

第二，美国将退出美国联盟，并拒绝提供全球安全和其他全球公共品，理由是提供这些商品只是鼓励其他国家搭便车。因此，华盛顿将要求为其目前提供的全球服务提供更高的租金。沙特阿拉伯可能会被要求免费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以换取美国海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可能会受到压力，要求其支付高得多的经济款项，以保留美国的石油安全保障。可能会终止其军事同盟，停止为公域提供安全保障，并恢复到一个范围较窄的、更加利己主义的防卫方式。

第三，美国将追求“肌肉发达但超然的军国主义”——强调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狭隘地把重点放在保卫美国上。五角大楼将投入巨资，建立威慑、击败、击败、或惩罚对美国的攻击。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到加强对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和研制其他反恐工具。然而，它将不再强调与充当全球警察，除非美国得到更高的租金。战后的国际主义者想要一个强大到足以维持全球秩序的军事力量，壁垒

美国将寻求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军队仅仅保护美国。

第四，美国官员将鼓励将责任移交给其他权力机构。华盛顿将支持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大国在势力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理由是维护东欧和东亚的秩序应该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美国的责任。同样，美国可能会鼓励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国家进行核扩散，以便它们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安全需要。

第五，美国壁垒将采取一种“赢了并且能够回家”的方式来处理反恐怖主义。美国将对圣战组织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部署大量地面部队，到加强轰炸行动，接受大幅增加的平民伤亡，再到接受有争议的措施，如介绍“黑色网站”和酷刑。但在击败了这样的组织后，华盛顿不会执行国家建设或稳定任务，因为这些任务很可能被证明是昂贵和令人沮丧的。

第六，美国基本上放弃通过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促进人权和民主。“壁垒美国”模式认为这种努力只是浪费了国内更好地利用的资源。因此，华盛顿应该把重点放在确保有形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包括通过与专制政权进行博弈，而不是追求自由民主等无定形的“理想”。

第七，美国壁垒将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以加强美国的主权，保护国家免受全球化的令人不安的副产品的影响。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迫使墨西哥支付费用），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限制并可能禁止难民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入境，都将在这一做法中占据突出位置。

第八，美国壁垒将寻求将美国从国际法、国际机构和多边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理由是这些安排往往阻止美国充分发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从联合国撤出以及退出侵犯美国主权或限制对美国的侵略追求的多边条约和法律制度。战后的国际主义高度重视多边协商和行动，而如今的美国将通过单边主义来强调维护华盛顿的行动自由——无论是在反恐或任何其他领域。

“美国壁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的负担，但是“美国壁垒”是建立在破坏国际体系是否仍然可以通过实现较窄的国家利益来实现红利。它忽略了战后秩序对美国的好处——从而极大地低估了摧毁这一秩序的成本。如果华盛顿采取一种更加零和的政策，以促进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如果它变得更加激进的单边和僵持，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美国的权力更具威胁，而不是让人放心。它们可能会通过外交、经济或其他手段坚决对抗美国的影响力。

接下来作者介绍了一个“更好的民族主义”政策。它不会破坏战后秩序，也不会撤销美国战后的计划，但它将采取更强硬、更有纪律的方式，在这些背景下

维护美国的利益，并且它还能够帮助建立起更稳定的国际秩序。

“更好的民族主义”政策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美国仍将领导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同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惩罚不公平的做法，并确保全球规则得到真正的尊重。

第二，更好的民族主义需要更尖锐的联盟管理。美国将重申联盟承诺，但要明确表示，如果没有有意义的改革和更好的负担分摊，这些承诺最终将变得不可持续。

第三，将是以自卫和集体防御为重点的重大军事部署。然而，它不仅投资于美国壁垒所强调的自卫能力，还投资于在关键地区和能力中的介绍增强了前沿存在。当然，这将是胡萝卜伴随着上述政策。

第四，加强了对美国生命和安全构成最直接危险的激进圣战组织的运动的打击力度。

第五，华盛顿将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此外，华盛顿将继续在海外促进民主和人权的非军事努力，因为它们促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

第六，重点将是坚持美国约束一些大国竞争对手的承诺，当美国的利益和主权被侵犯时，应该给竞争对手以更尖锐地反击，强调了维持地缘政治秩序的重要性。

一个更好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改善，采取这种温和、更积极的办法，能够提高行动效力，但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尽管一个更好的温和的民族主义将远远温和于“堡垒美国”，它仍将涉及重大的国际混乱。而且，有效地执行这种方法需要真正的技巧和复杂性，在操作上有困难。

作者对未来美国会采取哪种道路还持展望态度，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会盛行，以何种比例获胜，尚有待确定。人们担心，特朗普总统可能倾向于以其所有的破坏性影响追求堡垒美国；人们希望，为了国际秩序和美国本身的发展，本届政府最终会找到走向更好的民族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相当具有建设性的。

读完这篇文章，作者对于特朗普在未来的任期内会采取哪种战略尚不可知。但是，我们窥探特朗普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可知其偏向哪种战略道路。

2018年，特朗普为兑现竞选总统承诺推行31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主持修订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放松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刺激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做法，体现了特朗

普想要重振美国国内经济的决心。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正是因为全球化，使得美国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缩小，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升高，正是因为全球化夺取了美国人的职位，使得美国新增了大规模的穷人。由此，特朗普提出将制造业往回拉的政策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实现就业。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体现在国际贸易上，即是退出 TPP 等多边贸易协定，以双边贸易协定来代替多边贸易协定，譬如直接建立美日之间的自由贸易，在这种双边贸易中，特朗普认为会获得的更多，对于那些特朗普认为在过去的自由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的国家，比如中国，特朗普则毫不犹豫的展开攻击，在继 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25%的关税后，又对约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税，对中兴开罚单，要求加拿大警方逮捕华为副总裁孟晚舟，甚至联合欧、日提出针对中国的 WTO 改革方案，在美墨贸易条款中加入“毒丸条款”，为两国同中国签订自贸协定设置障碍。这一系列的做法，无非都是打击中国，最大程度的保卫美国的利益。这种打击是零和的，是不友好的，是灾难性的。在特朗普上台后，经济上的一系列的表现，我们可以概括出，是“唯美国利益至上的”，毫不留情的打压竞争对手，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并没有退出世界市场，对于打击竞争对手也不是毫无余地的，中美贸易战谈判，目前进展良好，因此，这不能严格算是一种壁垒美国模式的体现。

修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墙，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实行骨肉分离政策，大搞身份政治，在国内爆发的一系列种族冲突中，特朗普非但没有谴责暴力阻止者反而默认这种暴力冲突，可见特朗普维护美国主权的决心，维护土生土长的美国民众利益的决心，但是，从近期的美国政府长时间关门，特朗普与国会之间的拉扯来看，特朗普可能有心无力，因此，不能判断他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政策。

特朗普任期内，对于与盟友的关系也一改往常，不再是与盟友维持一种“蜜月”期，他认为美国在与盟友的军事防务中支出比例太大，因此他以退出北约为主要挟，要求提高盟友的承担程度，同样在与其他盟友的军事防务中，同样以不再提供保护为威胁，要求提高盟友在军事事务支出中承担的比例。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延续对盟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政策，以退出 NAFTA 为主要挟，向加拿大与墨西哥施压，最终签订 USMCA，使得美国成功获得加拿大 3.5%的奶制品市场；对欧、日、韩盟友施压，迫使同日本签订 TAG 谈判，与欧盟协商，促使其尽快进行 WTO 改革。因此，在美国同盟友的关系上的分歧不断的增大，同盟关系中日渐呈现出“盟而不同”的趋势。从这点上看，特朗普虽然威胁退出，

但是最终结果并不然，我认为，如果真的退出，对美国自身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得不偿失，所以，这对唯利是图的特朗普总统来说，是不可能的。

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特朗普认为美国对于一些多边贸易和协定“合则用，不合则弃”，大搞“退群政治”。特朗普任期内，先后退出《巴黎协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并且在一些全球公共品的支出上，比如难民、维和、公共卫生方面降低投入。这体现了美国不想要被国际准则束缚权力的意图，不想在公共品上承担过多的义务。

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上呈现出极端的现实主义色彩，重利轻义。比如不顾国际社会反对退出伊朗核协定重启对伊朗单边制裁，强化对伊朗的经济打压和战略围堵，以及在中东地区的撤军。这体现出美国不愿意在反恐问题上承担过多的责任，在反恐问题上尚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别说重建战后工作了。在意识形态传播上，美国也没过多的兴趣。这体现了“壁垒美国”的特征。

总的来说，特朗普政府的国内外政策偏向一种更好的民族主义政策，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点上并没有那么贴切的重合，但是总体上仍然符合“更好的民族主义”政策。

政府渗透能力视角下 印度“潘查亚特”制度的演变

曹宇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该文章由国际关系历史与专题课程教师潘兴明推荐。）

潘查亚特（Pandhayat）是在印度存在了很久的一种乡村管理机构，意为一一五老会。潘查亚特管理制（Pandhayat Raj）是印度独立以后在旧的制度上发展起来的乡村自治制度，又称乡村评议会制度，印度宪法第四篇总第四十条规定：国家应采取行动来组织潘查亚特，赋予他们必要的权力和权威，使之能作为一个自治单位发挥作用¹，在 1992 年印度宪法《第 73 次修订案》中，在宪法第九部分总第 243 条单独对潘查亚特制度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洋洋洒洒数千字，加上在 1957 年梅塔调查报告后 1959 年起各个邦陆续都出台了各自的潘查亚特法。潘查亚特已是现代印度乡村最普遍的统治形式。²2019 年 6 月 13 日的数据显示，在印度共有 630 个县潘查亚特，6613 个区潘查亚特和 253398 个村潘查亚特。³在印度历史上缺乏强力的中央政府和强效的动员组织能力的情况下，潘查亚特制度是印度政府和印度农村社会接触的媒介，在动员组织能力更有效率的现在，潘查亚特是在政府权力之下实现农村发展和管理的工具和组织。在政府的有意引导之下，现在的潘查亚特承担了非常多的诸如农业发展、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任务，随着政府的逐步放权，潘查亚特在印度的乡村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一、中央政府对乡村统治鞭长莫及：传统的“潘查亚特”

因为印度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在英国殖民政府之前，印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大一统，即使是在印度历史上最辉煌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时期，也没有完全统一整个印度地区，印度半岛南部并没有被阿育王统一。所以虽然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对乡村社会进行完全的渗透，而通过乡绅的形式来控制乡村社会，那么动员组织能力远逊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古代印度政府，对支配乡村更是力不从心。乡村一直享有高度的自治，之后不论是拉其普特人还是莫卧儿王朝，

1 https://www.india.gov.in/sites/upload_files/npi/files/coi_part_full.pdf

2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93.

3 https://lgdirectory.gov.in/rptConsolidateforRuralLB.do?OWASP_CSRFTOKEN=XT6F-PMU9-0H5D-GJVH-NY8B-GTA9-DJ0Y-BIGU.

都是如此，他们满足于征收田赋，无意也无力干涉村社事务。⁴

在古印度时期，乡村社会的村落有一种类型，他们的土地是共有的，享有很多共同利益，他们的公共事务由五位长者组成的“长老”会议共同处理，这是潘查亚特的原型。到了孔雀王朝时期，因为功能目的等的不同出现了许多潘查亚特，大体分为四类：种姓潘查亚特，一般会议的潘查亚特（村落潘查亚特），农业仆工的潘查亚特，单一目的的潘查亚特，其中前两类潘查亚特最重要，这是潘查亚特制度的雏形。

种姓潘查亚特按种姓划分，几乎每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潘查亚特，决定处理本种姓的内部事务，职能几乎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一般会议的潘查亚特则是以某一村落为管理范围的，它与种姓潘查亚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种姓制度本身的不平等性，种姓潘查亚特不仅可以处理本种姓成员的纠纷，还有权处理种姓地位比自己低下的其他种姓集团的案件。⁵而有的村落只有一个种姓，或者某一村落有一个种姓居于明显的统辖地位，其余种姓依附于这个种姓，这种情况下，该种姓的潘查亚特通常拥有对整个村落的控制权，类似行使村落潘查亚特的权力。这个统辖种姓的评判标准有很多，人数、土地和经济实力、种姓地位等。当一个村落有好几个统辖种姓或者统辖种姓的优势不明显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种姓潘查亚特可以掌控整个村落的权力。这种情况下则由整个村落各个种姓推出代表组成村落潘查亚特。村落潘查亚特主要由统辖种姓的人组成，但不排除低种姓的人，只不过没什么存在感。一般来说，种姓潘查亚特处理种姓内部的问题，如果问题超越了种姓则有村落潘查亚特出面或是由统辖种姓潘查亚特决定。如果哪个种姓没有潘查亚特或者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也有村落潘查亚特出面。当村落潘查亚特的处理结果对高种姓或者统辖种姓不利时，种姓头人可以宣布无效。⁶这里说明一下头人，潘查亚特里的领袖叫头人，他们的职位往往是世袭，他们是其所在团体的代表，必须听取本集团其他有影响的人的意见。

各个潘查亚特的职能也各有不同，种姓潘查亚特的职能主要是维护种姓制度，处理违法种姓制度的行为，这些制度的依据往往是习惯法和《摩奴法典》，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政府的渗透能力弱无法对印度乡村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些本该是属于政府的权力，只能由种姓潘查亚特代为行使，国王通常只审判城市案件及乡村的重大刑事案件。村落潘查亚特的职责则超越了

4 陈玉龙诗.古代印度村社司法中的潘查亚特及其现代影响[J].南亚研究季刊,2018(04):77-84+6.

5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90.

6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91-92.

“司法”，除了有维护秩序和道德的职责外，还要负责与政府打交道比如赋税等，以及宗教祭祀活动的组织协调。在这一时期，政府和村落只是在收取田赋，向国家输送兵员等方面发生联系，农民只有在缴纳赋税时同国家发生关系。⁷而具体在村落里收取田赋，划分土地，征收兵员等方面则几乎完全由村落潘查亚特代行。也正因为政府与村落的这种单一且脆弱的联系，使得传统潘查亚特得以保持相当大程度的自治。

随着历史的进程，印度的中央政府的渗透能力也有所加强，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出现了“柴明达尔”制，后来也被东印度公司借鉴。柴明达尔就是所谓的包税制，土地不再是村社共有而是属于柴明达尔（包税人），柴明达尔向政府缴税，而原先属于村社共有的土地则向柴明达尔缴税，其中就产生了剥削和压榨，此外柴明达尔也逐渐掌握了一些司法权，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武装。而作为政府的包税人——柴明达尔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就会对村落的事务产生影响，潘查亚特制度逐步瓦解。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潘查亚特又能得到不同的评价。潘查亚特的人数不局限在最传统的五人，但是这些头人们的地位通常不是选举而是世袭的，在评价头人的资格上，先天条件来的比后天条件更重要，这就有了一丝专制的意味。但是头人是各自集团的代表，在决定和处理问题的时候除了在潘查亚特内部商议以外，头人们还要各自听取其集团内有影响力的人的意见，又有了一丝所谓统治阶级内部民主的民主意味。与现代民主不同的是，这些“统治阶级”之外的人可以说对潘查亚特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虽然潘查亚特在政府渗透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获得了相当大的自治权，但对村里众多普通村民来说，专制的意味更强。⁸

二、殖民当局下的基层管理组织：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潘查亚特”

17-18 世纪，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逐步在印度确立了殖民统治，并逐渐统一或是说控制了整个印度，英国殖民者为了在印度攫取利益，加强了对印度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当然他们也有这个能力，比如通过改革土地和税收制度，通过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马哈瓦尔制等几种方式在印度扩大税收区，增大税收力度。圣雄甘地曾经说过：“印度不是生活在他少数的大城市里，而是生活在他 70 万个乡村里。”所以在东印度公司的压榨下，印度乡村首当其冲，传统的印度农村社会体制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大批农民流离失

7 中村の「インドの古代史」上卷，东京：春秋社.1963. P557.

8 黄思骏.印度农村潘查亚特制度的演变[J].史学月刊,1990(06):94-99.

所，土地兼并严重，土地私有开始被法律承认，出现一批新的地主。新税制培养出来的新地主，主要是原来中下层的柴明达尔封建主和商人---柴明达尔新地主。英国配制的新地主不再像过去的柴明达尔一样具有某些司法权，但对土地的权利比过去更明确和肯定了。他们对农民的命运握有全权，是农村的真正主宰。因为意识到是殖民政权在扶植自己，他们也就依殖民政权为靠山，成为英国人在农村的统治支柱。⁹

随着殖民当局和印度当地住民的矛盾不断激化，1857-1859年印度爆发民族运动，这场民族运动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印度开始直接受英国统治。

虽然印度的民族运动被镇压，但是使得英国殖民当局认识到对印度农村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要加强对印度农村地区的控制，并且应该借鉴英国地方自治模式的经验来建立有效的基层管理组织，于是潘查亚特作为印度传统的“基层管理组织”，在印度开始恢复。¹⁰1870年《孟加拉雇佣法案》决定在孟加拉重建潘查亚特制度，1882年《英署印度地方政府自治决议》是印度地方民主进程的大宪章¹¹，然而这一法案的执行效率非常低下。直到1905-1908年印度爆发独立运动，才给英国殖民当局敲响警钟，加快地方民主进程来巩固对印度乡村社会的统治。

1909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了一个“分散权力”的委员会，委员会强调为了处理当地事务，需要恢复村落潘查亚特的元气。¹²此后殖民当局相继出台了1912年《旁遮普村潘查亚特法令》，1914年《柯钦村潘查亚特法令》，1915年《阿萨姆地方自治法令》，1919年《孟加拉村自治法令》，1920年《马德拉斯村潘查亚特法令》、《孟买村潘查亚特法令》、《联合省村潘查亚特法令》、《比哈尔村管理法令》和《奥里萨村管理法令》，1921年《旁遮普村潘查亚特法令》，1925年《特拉凡哥尔村潘查亚特法令》，1926年《阿萨姆农村自治法令》，1928年《比卡纳村潘查亚特法令》，1939年《旁遮普村潘查亚特法令》和《卡劳利村潘查亚特法令》，以及其他许多法令。¹³这些法令大体上规定了关于村潘查亚特机构的组成、职权、财政等方面的条款。它们作为官方批准的“乡村自治机构”，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¹⁴殖民当局下的村落潘查亚特不同于传统的一定程度上自治的组织，虽然它也有诸如税收、土地分配、市场、治安、环境等职能，但是村落潘查

9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51.

10 张来.印度民主化进程中的潘查亚特制度[D].华中师范大学,2017.

11 同上

12Desai A R. Rural sociology in India[M]// Rural sociology in India /. Popular Prakashan, 1969.

13 黄思骏.印度农村潘查亚特制度的演变[J].史学月刊,1990(06):94-99.

14Desai A R. Rural sociology in India[M]// Rural sociology in India /. Popular Prakashan, 1969.

亚特在县管理局的直接控制之下，有些事情如果没有行政长官的允许，村落潘查亚特是没有权力像传统那样“民主”行事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此时的村落潘查亚特其实是殖民当局的地方基层管理组织。

英国殖民当局能将潘查亚特从一个“自治”组织变成一个基层管理机构的根源在于英国殖民当局因其先进的组织动员模式---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和作为后盾的强大的强制力量，这使得英国殖民当局拥有远超印度此前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渗透能力。特别是英国直接统治之后，英王直接统治使殖民地的国家机器进一步集中、统一和强化了。这个统治机器既是高压的，又在某些方面带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色彩。这就使英国统治者可以用软硬兼施的两手来保持对印度的严密控制。¹⁵

英国当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和殖民掠夺的要求打破了印度传统村落之间，村落和城市之间，村落和政府之间的相对孤立的状态。英国人的高税收政策极大的压榨了农民，使其流离失所，土地兼并盛行。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受到工业革命冲击的手工业者就成了工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渗透进了乡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社会长期保持的自然经济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冲垮，¹⁶而将这种自然经济以及相对孤立状态作为基础的村落潘查亚特，在时代的洪流下，发生了改变。

随着经济因素渗入乡村社会的还有政府的权力，东印度公司在县一级的主要官员是收税官和治安长官，收税官负责税收、司法和行政事务，治安长官则负责维持秩序，下属警察局来协助他的工作，并且拥有镇压的权力，村落潘查亚特也是直接受到县管理局的控制。70年代农村潘查亚特委员会一篇给国大党全印委员会的报告中写到英国统治时期潘查亚特瓦解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和司法权过度集中在政府官员的手中，极大的剥夺村社官员的权力和影响。¹⁷虽然在英国殖民当局强大的渗透能力下，村落潘查亚特本质上是地方基层管理组织，但是在村落潘查亚特被赋予的权力范围内，殖民当局并未进行太多干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殖民当局的这一做法给潘查亚特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给印度独立后的潘查亚特制度的确立埋下伏笔。

三、政府渗透下的三级管理结构：印度独立后的潘查亚特

15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14.

16 林承节.印度史[M].人民出版社.第2版, 2014:214.

17 张来.印度民主化进程中的潘查亚特制度[D].华中师范大学,2017.

印度独立后潘查亚特制度的演变大概经历了三个部分。在争议下把潘查亚特写入宪法第四十条，但是整部宪法中仅仅在第四十条和第 246 条还有附表第 7 表第 2 分表(各邦职权表)中第 5 条上提到了潘查亚特，上文提到过第四十条的内容，第 246 条的内容是“保证地方自治的顺利实施是各邦政府的职责”。然而仅仅是三条口号性的法律就如其宪法对“平等”的规定一样，软弱无力。附表提到的内容是(各邦拥有对)地方政府，即市法人、改进会、县政局、矿业调节机构，与其他为地方自治或乡村行政目的之地方机构等的组织与权力。

为了促进农村发展，印度政府在 1952 年实施了乡村建设计划，但是它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这就引发了政府对当时的农村管理体制即潘查亚特制度的思考与改革。¹⁸在 1956 年和 1978 年分别由以巴尔万莱特·梅塔为主席的委员会和以阿索卡·梅塔为主席的委员会对印度农村问题和潘查亚特制度进行考察，撰写报告并给潘查亚特制度的建设提出建议。但是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制度，更没有形成法律，潘查亚特制度没有被好好的执行，于是就有人认为缺乏宪法的支持给潘查亚特制度的建设非常大的局限性。于是在拉吉夫·甘地政府时期，开始了将潘查亚特制度宪法化的进程，在《64 次宪法修正案》被否决后，终于在 1992 年《第 73 次宪法修正案》中完成了这一进程，形成了现在的潘查亚特制度。

在独立并且立宪过程中，针对潘查亚特制度存在两派意见，以圣雄甘地及其追随者纳拉扬为一派，他们在长期的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将地方自治概念和村庄自治思想融合，赞同古印度传统的村社制度，认为这种自治组织可以避免权力过渡集中、党派斗争、集团政治及腐败问题。¹⁹另一派则以“贱民”领袖，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为代表，他们认为潘查亚特是种姓制度的恶果在现代国家中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传统的潘查亚特不是选举产生，也没有明确的任期，村落之间封闭隔绝，在村落内部凭借宗教及种姓的力量进行统治，这些都是旧制度的弊端，故而反对重建潘查亚特。最终经过妥协，潘查亚特制度没有写入宪法，但在并不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加入一条关于潘查亚特的内容（即第四十条）。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1952 年印度政府实施了乡村发展计划，来指导农村的建设。但是在实践中发现群众参与有限，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为了考察该计划存在的问题，1956 年以贝尔旺达·梅塔委主席的梅塔委员会开始调查并在次年提交了《乡村发展计划和乡村服务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这项计划没有激

18 刘晓红.论印度独立之后的潘查亚特制度的特点[J].沧桑,2013(05):78-80+91.

19 张来.印度民主化进程中的潘查亚特制度[D].华中师范大学,2017.

起人们参与的积极性的原因在于没有一种有代表性和民主的地方机构，来领导和实施这项发展计划。报告建议各邦应采取步骤逐步建立、实施潘查亚特制度，将一部分邦权力下放至潘查亚特，建立村、区、县潘查亚特的三级地方自治体：一个或者几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通过直接选举选出村潘查亚特，几个村潘查亚特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区潘查亚特，全县的区潘查亚特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县潘查亚特，县潘查亚特和县政府同级，名义上潘查亚特和政府机构不存在领导和指导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对各级潘查亚特事务的干涉很严重²⁰，他们的任务主要集中在乡村管理、开发还有卫生医疗教育等方面，依次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在通常情况下，中间一级的区潘查亚特最重要，掌握行政权，在执行国家及政府的任务同时也可以制定和实施自己的计划。县潘查亚特更多的是掌握监督权，协调区潘查亚特之间以及潘查亚特和政府的关系，在这一级潘查亚特中有大量的政府官员。

在报告发表之后，印度各邦渐次出台了各自关于潘查亚特的法规并着手建立潘查亚特制度，这一历史进程得到了尼赫鲁的大力支持，尼赫鲁将这一进程誉为“现代印度最具革命性和历史性的一步”。到1980年，印度有村潘查亚特212246个，区潘查亚特4451个，县潘查亚特252个，人口4.5亿。²¹

然而在尼赫鲁去世后，潘查亚特制度的建设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进程逐渐放缓甚至是停滞和衰落。印度的传统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权力被一个新角色---地方自治机构所侵蚀。²²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区发展部成为农业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并在随后改名为地方发展部，结束了潘查亚特作为一个单独的发展机构的地位。

在1977年人民党上台提出促进乡村发展的各项计划后，着手复兴潘查亚特制度，因为他们认为农村的发展工作离不开潘查亚特。于是以阿索卡·梅塔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考察潘查亚特制度的现状、衰落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潘查亚特体制研究报告》发表于1978年，它的主要内容是肯定1956年的取消区潘查亚特将三级潘查亚特体制改成两级，并且给县潘查亚特下放更多权力。然而由于人民党1979年下台而没有在全国推行。

印度最年轻的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后接任总理。当时的印度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官僚机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官僚牢牢掌控着

20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4.

21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3.

22 张来. 印度民主化进程中的潘查亚特制度[D].华中师范大学,2017.

地方事务。与之前推动潘查亚特建设的不同，拉吉夫·甘地的目的在于推动民主化进程。1989年拉吉夫·甘地在多份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起草了《第64次宪法修正案》，开始了潘查亚特的入宪进程，修正案内容除了对任期、选举方式、给边缘群体提供参政机会之外，更大的意义在于明确规定各邦要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潘查亚特，并且强迫全国实行统一的潘查亚特制度，不再是以前各邦根据各自情况制定各自政策的模式，在潘查亚特财政问题上同时有中央和各邦的财政委员会发挥作用。这等于直接中央直接给地方政府削权并且给了中央政府直接影响潘查亚特的权力。也正是因为这些权力斗争的意味，《第64次宪法修正案》在人民院（下院）获得通过，但被联邦院（上院）否决。

虽然《第64次宪法修正案》没有通过，但是潘查亚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在90年印度多党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时期就曾起草关于潘查亚特的宪法修正案，不幸的是草案在提交议会之前联合政府就倒台了。1991年纳拉辛哈·拉奥就任总理，提交了《第73次宪法修正案》并获得通过。

《第73次宪法修正案》是在《第64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修订的，在印度宪法的第九部分第243条，主要内容是1.在宪法中明确了潘查亚特是地方自治机构，每个邦都应该建立潘查亚特，实行村-区-县三级的潘查亚特三级机构，分别拥有行政权和监督权，立法权和潘查亚特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司法权在法律是被取消了。2.所有潘查亚特成员都由选举产生，村潘查亚特成员中不准有政府官员，潘查亚特任期五年。3.潘查亚特有征收和使用税收的权力，中央和邦政府对潘查亚特也会提供财政补贴。4.潘查亚特的权力和职能在宪法附表第11表中具体列举了29项，分别是：（1）农业，包括农业推广（2）土地改良，实施土地改革，土地整理和保持土壤（3）小型灌溉、水资源管理和流域开发（4）畜牧业、乳品业和家禽业（5）渔业（6）社会林业和农林业（7）林副产品（8）小型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9）印度土布，乡村和家庭手工业（10）农村住房（11）饮用水（12）燃料和饲料（13）道路、涵洞、桥梁、渡船、水路等交通工具（14）农村电气化，包括配电（15）非传统能源（16）扶贫（17）教育，包括中小学的教育（18）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19）成人及非正规教育（20）图书馆（21）文化活动（22）市场和集市（23）保健和卫生，包括医院、初级保健中心和药房。（24）家庭福利（25）妇女和儿童发展（26）社会福利，包括对残疾人和智力障碍人士的福利（27）弱势群体的福利，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福利（28）公共分配系统（29）社区资产的维护。5.给妇女、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等弱势群体的保

留席位。²³

在 1992 年《第 73 次宪法修正案》后，印度潘查亚特制度的建设暂时告一段落。从这半个世纪潘查亚特制度的起起伏伏来看，他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决于政治了。在立宪之初关于潘查亚特的两派争论可以感觉到，潘查亚特已经不再是古代印度因为政府渗透能力不足而在乡村自发形成的了，政府已经可以决定他的存在与否，已经有人建议放弃潘查亚特，固然因为它本身的缺点，还因为政府已经可以不需要他，来接触到乡村了。在独立后印度政府主动提出建设潘查亚特制度，这与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加强对乡村的控制不同，其目的在于政府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自治组织来帮助政府促进乡村的发展，这更说明印度政府的权力已经渗透到了乡村社会。而且在职能安排上，也与殖民时期在授权范围内的相对独立和自主不同，此时的印度政府可以直接干预潘查亚特权力内的事务，而且在掌握了主要监督权的县潘查亚特中充斥着许多政府官员，除了政府的实际权力之外，政府的人也渗透进了潘查亚特体制。在《第 64 次宪法修正案》中，潘查亚特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沦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斗争的一颗棋子。到了 1992 年《第 73 次宪法修正案》中，潘查亚特制度被写入宪法，其职能权力都得到明确的界定，许多权力也被下放给潘查亚特，试想如果政府的渗透能力还像过去那样，潘查亚特缺少什么权力需要政府下放？政府好不容易有能力拿到的权力又怎会轻易的下放？在宪法中，潘查亚特在法律上正式失去了司法权，当然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印度特殊的种姓制度，种姓潘查亚特仍存在着“僭越”和“不开化”的现象。

除了这些，最能体现影响力的因素——财源，也被政府把控了。与过去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治组织不同，作为政府主动提议并建立的潘查亚特掌握的财政权力并不多，其财政来源很大程度依靠税收、税收分享和中央政府与邦政府的拨款和补贴。并且在这其中他们自己得到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又只占到了很小的比例。税收主要是由村落潘查亚特负责，他们享有征收各种税、包括关税的权力，然而村潘查亚特往往为了他们的下次选举而不愿意征收一些可自主决定的地方税，更愿意依靠政府的拨款，而且虽然看起来可以征收的税目很多，但其实税费很低。区潘查亚特也有征收地方税的权力，并且有权规定税费的范围和数量，区潘查亚特能自行征收的税种包括市场税、贸易税、钓鱼税等。但是与村潘查亚特类似，虽然他们可以征收的税种也不少，但是为了不激发民怨以及选票的考虑，他们也会把相应的税种和税费控制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所以税收收入普遍占不

²³https://www.india.gov.in/sites/upload_files/npi/files/coi-eng-schedules_1-12.pdf

到区潘查亚特财政收入的 10%。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三级潘查亚特机构中最重要的区潘查亚特来说，政府的拨款至关重要，占了大约 85%的比例。²⁴大多数县潘查亚特就没有征税的权力了，基本只能依赖政府拨款，存在少数可以征税和收服务费的县潘查亚特，但其主要财源仍是财政拨款。

税收分享上潘查亚特可以与政府分享的税收种类包括来自农业用地的土地税、财产转移的印花税、铸币税以及森林收入还有一些本来属于地方机构但是因为管理原因由邦政府收取的税费。²⁵这些税收分享都是由邦政府收取再与潘查亚特共同分享的。村潘查亚特除了来自邦政府的贷款之外也没有另外自主增加贷款的权力，以上种种，因为各级潘查亚特都对政府的财政拨款存在非常大的依赖性，使政府对印度乡村的渗透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政府的影子除了在财源方面无处不在之外，在如何花钱的问题上政府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绝大多数的邦里，村潘查亚特想要使用资金——无论是专项的还是—般性的，都要得到上级政府的核准。在 1999-2000 年间，大多数邦的一般性行政开支中，大部分都花在了职员的薪水和捆绑性的发展拨款这些项目上，一般性的行政开支占潘查亚特总财政支出的 80%以上。绝大多数的剩余支出则用在义务服务上，而由潘查亚特自主决定的资金只占不到 2%的比例。²⁶所以通过观察潘查亚特的财政问题，我们更明确了政府对潘查亚特的影响力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当然了，由于印度社会中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强大的影响，许多在法律上的规定仅仅停留在法律上，也因为种姓和印度教，许多印度乡村仍然是封闭、隔绝和落后的，并且法律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此外印度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相对于发达民主国家，相对于中国，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印度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争权问题很严重，在莫迪上台后稍有缓解，本身还有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分离势力的问题，但是我们站在印度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他们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和渗透能力的增强，不仅仅是潘查亚特制度，还有很多印度的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24 刘昌威. 印度村民自治制度—潘查亚特研究[D].湘潭大学,2017.

25 希哈·贾,丁开杰.印度潘查亚特制:职能、事权和资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01):114-119.

26 同上

What is Politics?

Paulo Pliego,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该文章由比较政治学课程教师张昕推荐。)

One of the problematic aspects of politics is that the term politics is defined differently by different scholar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ze multiple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politics to see how 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I will focus on “politics as allocation”, “politics as us against others”, “Arrow’s possibility theorem politics”, and Friedrich Hayek’s definition of politics.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of each definition and comparing them, I will describe the most preferred position of politics.

Politics as allocation deals with “the allocation and handling of a resource” (Poggi, 3). This means that the purpose of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is definition is to redistribute goods between people. Although politics as allocation tends to divert in three different sections (custom, exchange, and comm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as allocation is command-based allocation. Without a command-based allocation, the other two sections of politics as allocation would not function properly. The reason is that “It is demonstrably clear that neither custom nor exchange, nor both together, can do all the allocating that has to be done. There are bound to be contingencies that cannot be met except by command-based allocations” (Poggi, 4). Therefore, for allocation to fully function, the government must allocate some of the resources.

The other meaning illustrated by Poggi is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s of US versus Them. This concept illu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defending the state against the enemy. Politics here is defined as the figh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collective.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idea that politics is “accordingly concerned with set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ollectivities, and in particular with protecting each collectivity’s cultural identity from outside threats” (Poggi, 6). This definition of politics of us versus them illustrates the idea that politics is a collective of people who have a similarity whether is culture, geographical, or linguistic. This similarity unifies the people into a collective and it creates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Therefore, the idea of

us versus them is illustrated by the thought that their existence can be challenged or destroyed by a different collective with different ideals.

Arrow's theorem implicitly describes another definition of politics that contrasts the prior two. The main concept of Arrow's theorem is the idea that no system can functionally consider each person's choice. Arrow's theorem can be defined as politics for the people. Arrow's theorem "significance is that it proves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impossibility of making governmental decisions conform to the preferences of a majority of the electorate for the basic reason that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will often be unknowable" (Douglas, 70). The theorem proves that it cannot consider each individual consideration. The politics of Arrow's theorem is the politics of the few. Each person is aware of their preferences, but the politicians cannot know each preference. Therefore, Arrow's theorem proves that it cannot be the case for people to choose for themselves.

Politics of allocation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what a government should do in order to create a functional system. Politics of us versus them focuses on protecting the collective from outside threats. Politics from the Arrow's theorem focuses on how populism cannot be achieved as there is no system that can take every consideration. Their main difference lie that the first definition has a basis on economic thought. It is a liberal argu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 second definition continues the tradition of the realist argument that a rational state only focus should be its security. The last definition of politics is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While the first two definitions concentrate mainly on how politics govern a state, the third definition appears to focus more on how a state cannot consider all the preferences of individuals and that the state should mainly focus on the majority.

The preferred position of the three distinct definitions of politics is "politics as allocation". Although it is necessary to include the realist thought that the state can be destroyed by an outside force, the new thoughts of the liberal school and economists focuses o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ts preventative measures of war is of more value to me. Although I value security issues, I believe that at least for democratic states, there is a bigger need for politics as allo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priority of any state even if it means that the state should control allocation of certain resources such as tax revenue, public goods, etc.

One of the missing key dimensions of politics is explained by Friedrich Hayek. Hayek in his book *The Road to Serfdom* implicitly argues about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politics that closely resembles politics of allocation. Hayek believes in politics of allocation, but he strongly argues against the politics of command-based allocation. In this definition of politics, the difference mainly is on how command-based allocation should be limited or eradicated because each person is responsible of its own happiness. Hayek's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focus should be in not interfering with the free market since an individual is responsible for preferences. If an individual is not content with an exchange, the individual can find someone else that will satisfy his preference. In a sense, Hayek argues that individuals are responsible for where they invest their preferences and if they are discontent, the individual can find another party that will satisfy their needs.

The definitions of politic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different scholars view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each definition has its strong theoretical arguments, they also include some theoretical weakness. Each definition encompasse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nd of politics. Some are concerned with security, other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s with individual choice. There is not a definition that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s, but there is knowledge that one of the definitions can be more helpful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The following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regime.

Michael Mann and Robert Dahl analyze what constitutes a state and a political regime respectively. Mann's focus is on the importance of a territorial centralized state, while Dahl's focus is on democratizing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once a state is established. I will briefly explain each authors argument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typologies explained by each author. I discover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ypologies, but Dahl's typology can function as a successor to the establishment postulated by Mann in his typology.

For Mann, there exists a 2 by 2 topology that constitutes territorial and

centralized form of government, and despotic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This typology serves to examine how states can survive and function. Mann argues that for a despotic or infrastructural state to exist, there must be a territorial centralized state. A territorial centralized government is when “political relations radiate outwards from a center to cover a territorially demarcated area, over which it exercises a monopoly of authoritative binding rule-making, backed up by a monopoly of the means of physical violence” (Mann, 112). A state can only exist if it satisfies these two conditions. A territorial centralized government then can diverge into a despotic power or an infrastructural state. An infrastructural state is when the state has the “power of state to penetrate and centrally coordinate the activities of civil society through its own infrastructure” (Mann, 114). On the other hand, a despotic state is the concept of “state over civil society” (Mann, 113). It “allows the government to do as they please” (Mann, 113). In a despotic state, “The range of actions which the elite is empowered to undertake without routine, institutionalized negotiation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This illustrates that a despotic government still need to have a territorial centralized state for the government to use their power for their own benefits.

Robert Dahl also describes a 2 by 2 typology of what a political regime is. Robert Dahl argues that a political regime will contain an element of public contestation and inclusiveness. Each element of a political regime will determine if a political regime is a competitive oligarchy or an inclusive hegemony. Dahl main emphasis is on analyzing how political regimes can achieve democratization, or as he calls it, achieve polyarchy. Public contestation is the concept of the number of elections. Inclusiveness is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that can participate in public contestation. The more public contestation that a state provides, it “means that a state or regime becomes more competitive”(Dahl, 7). This relates to competitive oligarchy. The more participation there is, the more “it might be said to change toward greater popularization, or that it is becoming inclusive” (Dahl 7). This reflects the political regime of inclusive hegemony. Dahl’s postulation focuses more on how a political regime can change.

The two different typologies analyze different factors and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ologies. The typology described by Mann deals with how

despotic and infrastructural states need to have territorial centrality in order to exist. Dahl's typology deals with how a political regime can be defined depending on its inclusiveness and contestation. Dahl believes that "for a political system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is the quality of being completely or almost responsive to all its citizens" (Dahl 2). This idea of Dahl illustrates that a political regime should in theory serve each citizen using participation and contestation.

Mann would argue that a state can be a despotic power in which the state is over society. This opposes to the idea of Dahl that argues that a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be responsive to all its citizens. Although Mann is not stating that a political system shouldn't be responsive to its citizens, Mann argument is just to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despotic and an infrastructural government. Therefore, since there is no emphasis on if a despotic government is right or not for the citizens, the two arguments have no direct relationship.

Mann is mainly describing how a state whether is despotic or infrastructural essentially needs a territorial centralized government. This idea differs because Dahl concentrates o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Mann's concept in a sense serves to build a state that can fully operate in a centralized manner in a specific territory. Dahl's argument can be thought of as the process that succeeds Mann's argument. After the government can establish a despotic or infrastructural form of state, then Dahl's theory can contribute by explaining how each of those states can move into a polyarchy. Although there is not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ypologies, Dahl's typology can serve as complimentary to Mann, but neither is necessary to each's typology. Mann's analysis of the state is independent, but Dahls' typology can serve to build up from Mann's analysis.

The typologies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because contestation or inclusiveness is "only one characteristic of systems; a characteristic that cannot be interpret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other characteristics" (Dahl, 5). This point illustrates that Dahl is looking at variables that categorize political regimes while Mann is looking at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They are not relatable because Mann is looking at the whole while Dahl is looking at the particulars of a political regime.

Michael Mann and Robert Dahl contribute to the idea of what a government is by

looking at what makes a state, and what determines a political regime respectively. Both authors illustrate a 2 by 2 typology that focuses on state and political regime. The ideas postulated by the authors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and have no direct relationship. Although Dahl's idea can contribute to Mann's article by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a political regime after establishing a state.

我院学生赴日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 国际会议有感

杨胜兰²⁷

首次到日本，第一感觉是日本的街道很干净，几乎看不到垃圾。这一景象使我想起了 1964 年日本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没有留下一片废纸垃圾的报道，为了迎接奥运，日本进行了垃圾分类并指定倒垃圾的时间、场所，这一规定沿用至今并影响着日本国民。这和现在上海正在实行的垃圾分不无相似之处，希望这一举措能够继续坚持并卓有成效。

无论是在日本的餐馆还是超市，还有住宿的宾馆，服务员都很有礼貌、很客气。在街区，很难看到横穿马路、闯红灯的行人。工作日上下班期间，看到的男士穿着打扮都很正式，很有精神。我想这也是日本国民的素质体现之一吧。最后，在参观明治神宫期间，有来自军界、政界、商界等许多人士前去参拜。正是由于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许多人士前去纪念使其国家走向强大的历史人物，我想这也是一种感恩、铭记的表现。

对于东京大学，作为迄今已培养 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校，首先给我的印象就是其古老的建筑和校园内粗壮的银杏树。从其老旧的大礼堂、墙砖泛青的图书馆以及文学部大楼的电灯开关可见东京大学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人文底蕴。但同时，东京大学也有其现代性的一面，比如其便捷的中央食堂、有着现代风格的便利店以及实验大楼。最重要的是，我接触到的东京大学的学生都来自各国著名高校、知识渊博而富有文雅。

关于参会的发表交流，从个人旁听的几场小组发言来看，很多老师感兴趣的是有新东西、新发现的文章，而且很多提问的外国学生和老师会一直问他感兴趣的问题，直到自己完全弄明白。我想这也是许多外国学者会创新、有创新的原因之一。

许多参会的学生尽管自己的研究可能还不够全面、到位，但是他们很自信，能够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综合运用，回答问题时也从容淡定。和我在小组发言的老师和同学相比，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掌握。尤其是在问题意识方面，要多向外国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问题的思考，不能 Describe，而是要 Explain。

²⁷杨胜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通过此次会议的参与，我深刻感受参与会议前期准备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将自己最具创新点的东西展现出来，这样才能与其他学者进行深入交流与对话，同时也能从其他学者那里得到有用的意见与建议。本次学院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走出去学习、参与国际性的会议。有对比才知自己之不足，同时也是对我们成长的一种锻炼。这种形式的交流学习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学习方法。



杨胜兰和东京大学松里公孝教授合影留念

朴荣浩²⁸

结束 5 天的日本参会后，对日本的印象是整洁和礼貌。整条街都很干净，一个小垃圾也找不到。而且日本人非常有礼貌地尊重别人。东京大学的建筑虽然旧，但背后是时间的流逝，给人一种幽静的氛围。虽然在日本一直下雨，移动起来有点不方便，但由于下雨能够看到东京的下雨景象，也算是另类的收获了。

对我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此次会议，我花了数月时间进行研究，无论完成的结果如何，我在整个过程中的收获非常多。发言后，教授们也认真、切入要害地提问并建议，这些

28朴荣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互动让我进一步成长。而且通过听取世界各国学者的发言，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灵感，与他们建立人际关系网，后续可以进行沟通。

230 多名的参会者，130 多篇的论文，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审阅所有参会人员的论文，按照主题分类论文，组织每个小组，定时间和地点等，要注意的事情非常多。值得称赞的是日方成功地完成这样了不起的工作。关于组织会议，总体上是非常满意的。另外，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给我参加此次东京会议的机会。在学生的立场上，跟世界各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甚至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给我的未来提供非常好的养分。希望我院以后也给学生如此宝贵的发展机会。



朴荣浩于东京大学留念

张严峻²⁹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六月的东京已过了樱花四月，温润潮湿，新荷未放，几株紫阳花点缀，满目是新绿。从东京大学步行至上野公园时，便自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眼中“也无非是这样”的东京。如今花下虽无成群结队、盘着大辫子的“清国留学生”，却总时不时与不同肤色的如织

²⁹张严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游人擦身而过。

“是走向一个愈渐分化的世界，还是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在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迎来它的第一个十年之际，会议主题明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预示了欧亚研究领域思想碰撞的新开始。25个国家，250多位专家。会场上有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有出生于爱沙尼亚的泰国教授，有操着一口标准日语的俄罗斯专家，也有像我这样的中国学生。从俄罗斯到大欧亚，从当代社会政治问题到秩序重建与大国关系，参会者谈区域经济合作，谈文学与国家形象背景，也谈艺术与外交关系，从历史遗留问题中辩古今，从区域一体化前景中寻真理。

会议开幕式前，我在东大法文楼下偶然碰见 Hoshiro さん，他举着组委会的小旗子，向我们频频问好。两年前的六月，我曾和包括他在内的十几位日、韩参会者，聚在韩国中央大学会场外的小餐馆里，兴致勃勃地品尝店家自酿的米酒。这两日东京开始下起小雨。穿过拥有百年历史的东大赤门，入目是校内遍植的银杏树、喜马拉雅松和香樟树，池山环绕，鱼鸟游掠。我忽然又想起鲁迅先生在1925年于灯下的散文诗中的感慨：是安于“昏沉的夜”的迷雾中，还是去追寻一片错综着“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的“云锦”。东亚会议本身便似这方云锦，它如“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



赴日参会部分学生合影(第一排左二为张严峻)

Dinara Rakhimzhanova³⁰

During this trip to Tokyo, first of all, I was impressed by Tokyo University, as it was my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this great place. Initially, I assumed that I would most likely see the usual average modernized university, but instead I saw an old “landscape museum” with full of history and magic. As if I have visited a castle! I was struck by the amazing ancient architecture of this university, which is expressed in a royal style.

We were very warmly welcomed by the organizers of the East Asian Conference on th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who perfectly dominate several languages, particularly in Russian.

There was a very pleasant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that helped us to reintegrate into the workflow.

Further, me with my classmates were doing preparation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ference. My classmates, including professors of our institute, always provided assistance and support in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ur ECNU team was represented by a united spirit, which means that we were a single, indivisible team, pursuing a common goal to represent our university with dignity. Thus, we presented our reports at the conference. The experts listened with attention to all reports. They asked questions, which was evidence that the reports were relevant, informative and helpful. Some adjustments were made by experts, and also they have gave future directions regarding our work, which is a significant impetus for young beginners of our outstanding university. During my presentation, a scientific expert made a remark that my topic is very complicated to study and requires further development with such competent mentors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structured analysis was given which would help me in the future develop the topic. In addition, we with the students visited a one-day tour in Tokyo, which brought us closer togethe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ast Asian Conference on th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was held at the highest level.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we were

³⁰Dinara Rakhimzhanova,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given a program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ference. Time-management for each panel was strictly observed, and Japanese experts appreciated the work of the participants. To be participant in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as a great pleasure and honor. Firstly, I believe that this is an excellent chance to meet with leading thinkers, expert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o gain useful knowledg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econdly, I think that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many wonderful opportunities to meet new friend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Our university has provided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lf-realization.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end students to this kind of conference, as it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self-awareness period. And to crown it all it raises the prestige of our university and also promot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 would like to note the high degree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 of our professors, especially YAN DE XUE and Sergey Biryukov. During the trip, professors constantly guided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academically prepared us. This fact shows that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s work in our institute. I made a lot of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for myself, having attended such a high-level conference. This opportunity given by our university provided a further professional vision of my future profession.



赵亚娜³¹

“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2019年4月恰逢日本步入令和时代，有幸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各位老师、同学一道于东京大学参加第十届东亚会议。第一次来到日本，因为主要任务是参加学术会议，除会议最后一天的东京一日游之外并没有特意独自安排游玩行程，但是不经意间的发现充实了这趟东京之行。我们所住的地方位于文京区本乡，靠近上野、东京银座、池袋，在这里既可以去上野感受日本的历史、艺术文化，也可在东京银座看到国际化大都市繁荣的商业文化。会议第一天结束后，同学们结伴步行去上野公园参观，沿途竟巧合遇到了日本著名的供奉日本学问之神的神社汤岛天满宫，尽管日本民众的祈愿仪式同国内有较大差异，但是我们感受到了同样的对学业进步、事业成功的愿望。建筑、宗教文化之外的人文同时让我感触颇深，尽管不会日语，但是简单的英语与奇妙的肢体语言表达意思后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对此深表感谢。我们开会的会址是东京大学的主校区，其地址原是江户时代的加贺藩主的官邸，也许这一背景也解释了为什么能够在校园背后看到一隅的山水景色，置身其中丝毫感受不到原是身处东京区。日本大学几日的学习记忆最深刻之处竟然是东京大学的食堂，食堂餐盘回收的地方竟然没有看到有人扔掉剩余的食物。东京之行处处刻刻都感受到了日本人尚简、节约的行动。

于东京参会是首次参加国际会议，会议形式同国内的大型会议在形式上有相近之处，各种关于斯拉夫——欧亚研究的主题会议可以选择。第一天就发现我感兴趣的话题，女性与战争问题，但是由于该 panel 的参与人认为使用俄语更方便沟通将交流语言换成了俄语，为理解该主题的交流增加了障碍，所幸有部分图表可以让我了解个别学者是如何展开他们的研究的。我个人的论文介绍中复旦大学冯玉军老师提出了问题，质疑我论文的结论在美国制衡的背景之下未来中美与美俄关系的变化。反思发现论文在展望与预测部分仍是缺乏论证支撑。对比总结其他 panel 的话题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感兴趣的是有趣、“小”的 idea，对大理论下的研究并不是很感兴趣。对我自己研究的反思，我认为应该将论文研究的重点发在小而精的论点上，论点太大会难以把握而且会使自己的论文变得无趣以及没有

31赵亚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意义。



赵亚娜于东京大学留念